

王水照主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本宋學研究 六人集 (第二輯)

平田茂樹

● 著

宋代政治結構研究

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 (第二輯)

土田健次郎《道學之形成》

近藤一成《宋代科舉社會研究》

遠藤隆俊《宋代蘇州范氏家族研究》

平田茂樹《宋代政治結構研究》

高橋弘臣《宋金元貨幣史研究——元朝貨幣政策之形成過程》

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研究》

上架建議：海外漢學/中國史研究

ISBN 978-7-5325-5488-1



9 787532 554881 >

定價：38.00元  
易文網：[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六人集

D691  
7

D691. 2  
72

主編

宋學研究 六人集 (第二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平田茂樹 著

林松濤 朱剛等 譯

宋代政治結構研究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代政治結構研究/(日)平田茂樹著;林松濤 朱剛  
等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

(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第二輯)

ISBN 978-7-5325-5488-1

I. 宋... II. ①平...②林...③朱... III. ①政  
治制度—研究—中國—宋代 IV. D69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217927 號

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第二輯)

宋代政治結構研究

[日]平田茂樹 著

林松濤 朱 剛 等譯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mailto: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2 插頁 5 字數 275,000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300

ISBN 978-7-5325-5488-1

I·2164 定價: 3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 前 言

王水照

2005年，我曾主編一套《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為各種客觀條件所限，那套書收錄的六位日本學者的論著都是有關宋代文學的。此後，我又陸續聯繫到研究宋代思想、歷史的六位中青年學者，故現在有條件編成第二輯。相對來說，這第二輯涉及的領域比較廣泛，包括了宋代思想、政治結構、士大夫社會、家族、都市、貨幣等多個方面的研究，對於國內同行了解和參考日本宋學研究的最新成果，相信會有幫助。

第一輯的《前言》曾就“宋學”一詞作過解釋，嗣後仍有讀者質疑於我，這裏繼續談點個人的看法。清人將“宋學”與“漢學”對舉，分指義理之學和考據之學，這是從治學方法上對宋明和漢唐儒學之特點進行比較總結的結果，當然有其合理性。但是，特點並不等於全部，如在漢唐學術和宋明學術的意義上理解“漢學”和“宋學”，我們根本無法想像哪個時代的學術是只有考據沒有義理，或只有義理沒有考據的。事實上，漢代今文經學的長處並不在於考據，而有些宋代學人對制度史的敘述，對書目、金石、譜牒之學的關注，對詩文用典的細密調查，都充分展示出其考據的能力。我在第一輯的《前言》中提到日本學界自內藤湖南以來的“唐宋變革論”，其中包含了對漢唐

學人和宋明學人的身份區別，即前者多為門閥士大夫，而後者基本上是科舉士大夫。這至少能提示我們，可以從學術承擔者的身份、立場、旨趣之差異，去認識以上兩種學術形態，因為士大夫身份的這個歷史性變遷，正好與傳統的“漢學”、“宋學”對舉之說相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不妨以宋代（或者還可以包括元、明）的全部物質和精神文明為“宋學”的對象。如果研究者的心目中保持了對漢唐和宋明之區別的關注，那麼他的“宋學”研究並非只有利於對宋代歷史現象的認識。日本學界已有非常顯著的事例，比如宮崎市定對“唐宋變革論”的深入闡述，就給他的學生吉川忠夫寫作《六朝精神史研究》帶來極具根本性的啓迪。

在世界文明的總體格局中，中國文明無疑據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對於人類歷史整體的意義，決定了“中國學”必然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就如希臘學、印度學相似。就此而言，海外“中國學”的成果對於我們來說，決不僅僅是“它山之石”，那些不同國籍和膚色的“中國學”者，是我們不折不扣的同行，不瞭解他們的成果，就很難令我們自己的研究真正處於某個領域的前沿位置。也就是出於對“前沿性”的關注，我們這套叢書所選擇的都是日本中青年學者的著作，這些學者無一不在日本的大學裏擔當着教學和科研的現任。翻閱這套叢書的讀者不妨想像，日本的學生正在講臺下聆聽和記憶同樣的內容，儘管這對他們來說顯得艱難，但這些學生從不要求教師把講義做得淺顯通俗。爲了做好畢業論文，他們必須去挑戰一些包括中國學者在内的他人尚未掌握的東西。

我對這套叢書的學術質量抱有充分的信心，如果有些不足之處，可能是在翻譯上。日本“中國學”歷史悠長，積累深厚，產生過不少經典名著，現在國內學界有較多人樂於翻譯那

些名著，但對目前正在大學擔當講席的學者取得的最新“尖端”成果，卻不夠重視。這個情況有礙交流，所以我們勉力做了這件工作。但可想而知，翻譯是艱難的，譯者不僅要通曉中日兩種語言，還要懂得專業知識，甚至必須對原作者有所了解。姑且不論這樣的翻譯工作能否為譯者帶來利益，僅僅是譯者們不同的表述習慣，就會影響到叢書的整體風格，更何況還有幾位譯者合力完成一本書的情況。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輯們在文字處理上費了大量心力，他們的工作效果顯著，但我仍願意承認，這套書的翻譯僅以傳達論著的學術內涵為目標。如果有的論著經過了歷史的檢驗，而獲得經典的聲譽，那麼將來一定會有更好的譯本問世。目前的譯文不能盡如人意，只好敬請諒解，同時也真誠地期待批評。

海外“中國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是關於中國歷史和現狀的研究，這又必然制約於其本民族的文化背景，研究者的“異域之眼”離不開自身的學術傳統，民族感情甚或意識形態等政治因素均不可避免。然而，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我贊同有的學者所提出的“文化的饋贈”的觀念和原則，就是說，既然是“饋贈”，受贈方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立足民族本位，自主選擇，不必自餒或自閉；饋贈方應本“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而力戒優越感或自大心理。海外流行的“中國中心論”，如果是強調研究中國問題應注重中國人自己的觀察視角，不能一味用以“異域之眼”，當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指世界文化應以中國為“中心”，我們聽來似覺順耳，實在應引起警覺。國內流傳的“河西河東”之說，當作是對未來世界文化中心歸屬的預言，似無實據；如果指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一種現象，也是符合實際的。比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唐代中國是先生，平安日本是學生，到了明治維新以後，中國變成了學生，國人紛紛通過

日本的中介和橋梁吸取西方的新知。陳寅恪先生有詩云：“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於當時國內之學術衰微，感慨遙深，所寄寓之振興期望，感動學界；而時至今日，已可調整心態，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力求在跨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鋒中求得共同的發展，使“中國學”真正成爲一門世界性的學問。這也是我們組織出版這套叢書的目的。

2009年歲末於復旦大學光華樓



## 序

自筆者有志於宋史研究，至今已二十餘年，其間一直不斷探究“何謂政治”這一問題。在此過程中得出的結論極為簡單。

H. D. Lasswell 在其所著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中，將行使權力的社會關係稱作政治，認為從動態的觀點來把握政治的話，其無非意味着“誰，何時，怎樣，做成什麼”。至今為止的政治史研究，以制度史或政治事件史為中心，很難說對於實際產生出政治的複雜機制給予了充分的探討。本書倒是試圖通過將焦點置於具體的政治過程得以產生出來的、存在於其背後的政治結構上，來揭示 H. D. Lasswell 試圖說明的“誰，何時，怎樣，做成什麼？”這一極為簡單的政治原理。本書中出現了政治過程論、政治空間論、政治溝通論等不免有標新立異之嫌的表達方式，這些都不過是體現了儘量簡明地理解政治的一種嘗試而已，對於政治是在怎樣的時間與場所中，如何通過人與人的關係而產生出來的，從多種角度進行了探討。

不過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本書並非系統性研究著作。而主要是彙集在中國大陸、中國臺灣以及韓國等海外學術會議上使用中文發表的文稿而成的論文集，因此內容中重複之處甚多。另外附帶指出，還有諸多日文論文未收入，故導致此中

文論集中存在部分內容說明不夠充分的問題。

本書所收論文的日文標題,以及在海外學術會議上發表的情況如下。

1. 《日本宋代政治制度研究述評》(收入《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該論文原題為《政治の舞臺裏を読む——宋代政治史研究序說》(《知識人の諸相——中國宋代を起點として》,勉誠出版,2001年)。

2. 《日本宋代政治研究的現狀與課題》(《史學月刊》308,2006年6月)。該論文原題為《宋代政治構造研究序說》(《人文研究》57,2006年3月)。

3. 書評《王瑞來〈宋代の皇帝權力と士大夫政治〉》(《史學雜誌》112—6,2003年6月)。

4. 該論文原題為《宋代の言路官について》(《史學雜誌》101—6,1992年6月)。

5. 《宋代の朋黨形成の契機について》(《宋代社會のネットワーク》,汲古書院,1998年),其中的一部分以《從小說史料看宋代科舉社會的結合》(《科舉制的終結與科舉學的興起》,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為題發表。

6. 《從劉摯〈忠肅集〉墓誌銘看元祐黨人之關係》(《東吳歷史學報》11,2004年6月)。其後以《劉摯〈忠肅集〉墓誌銘から見た元祐黨人の關係》(《宋—明宗族の研究》,汲古書院,2005年3月)為題在日本發表。

7. 該論文原題為《宋代政治構造試論——對と議を手掛かりとして》(《東洋史研究》52—4,1994年)。

8. 《宋代政治史料解析法——〈時政記〉と〈日記〉を手掛

かりとして》(《東洋史研究》59—4, 2001年)。

9. 《周必大〈思陵錄〉、〈奉詔錄〉から見た南宋初期の政治構造》(《人文研究》55—2, 2004年3月)。定於近期在中國的雜誌上發表。

10. 《從〈歐陽修私記〉考察宋代的政治結構》(《歐陽修與宋代士大夫》,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9月), 該論文原題為《〈歐陽修私記〉から見た宋代の政治構造》(《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別冊專輯, 2006年5月)。

11. 《解讀宋代的政治空間》(2007年9月5日, 在召開於臺灣政治大學的, 第三屆中國史學會“基調與變奏: 7—20世紀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 該論文其後以《宋代の政治空間を如何に讀むか》(《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專輯《文獻資料學の新たな可能性(3)》, 2007年12月)為題發表。

12. 《宋代地方政治管見——以劄子、帖、牒、申狀為綫索》(2006年9月25日, 在召開於上海師範大學的“唐宋時期的法律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 該論文曾以《宋代地方政治管見——劄子、帖、牒、申狀を手掛かりとして》(《東北大學東洋史論集》第11號, 2007年12月)為題發表。

13. 《宋代の列女顯彰の構造——〈宋史・列女傳〉を手掛かりとして》(《アジア遊學》91, 2006年9月)。該論文曾於2007年9月7日, 在召開於韓國慶北大學的中國史學會第八屆國際學術大會上進行了報告。

論文翻譯得到陳力、林松濤、宋姍姍、施愛軍、顧國玉、朱剛諸位的協助。並且在編輯論文過程中, 大阪市立大學的諸位研究生給予了協助。而且在中國大陸、中國臺灣以及韓國

的學術會議上發表，在各專業雜誌上刊登之際，承蒙包偉民、吳松弟、劉海峰、劉靜貞、朱剛、戴建國、任大熙諸位教授的關照。在此論文集幾經波折而得以問世之際，謹向給予筆者幫助的諸位同仁致以深切的謝意。

平田茂樹 記於 2007 年 12 月

# 目 錄

前言 王水照 / 1

序 / 1

日本宋代政治制度研究述評(陳力譯) / 1

日本宋代政治研究的現狀與課題(林松濤譯) / 24

書評：王瑞來著《宋代皇帝權力和士大夫政治》

(宋姍姍譯) / 44

宋代的言路(林松濤譯) / 57

宋代朋黨形成之契機(林松濤譯) / 98

從劉摯《忠肅集》墓誌銘看元祐黨人之關係

(顧國玉譯) / 143

宋代政治結構試論——以“對”和“議”為綫索

(施愛軍譯) / 161

宋代政治史料解析法——以“時政記”與“日記”為綫索

(施愛軍譯) / 190

從周必大《思陵錄》、《奉詔錄》考察南宋初期的政治結構

(朱剛譯) / 224

從《歐陽修私記》考察宋代的政治結構(朱剛譯) / 268

解讀宋代的政治空間(林松濤譯) / 289

宋代地方政治管見——以劄子、帖、牒、申狀為綫索

(林松濤譯) / 334

宋代表彰列女的結構——以《宋史·列女傳》為綫索

(林松濤譯) / 360

# 日本宋代政治制度研究述評

## 一、前言 / 日本宋代政治史

### 研究的現狀和課題

宋代的士大夫是以科舉為基礎而產生出來的儒士，這一觀點目前已經成為日本學界的共識。宋代的士大夫一方面具有文人、讀書人的面孔，同時也具有地主、資本家的面孔。他們在把“經世濟民”作為共同的政治信念的同時，實際上是想通過科舉考試難關來實現其“升官發財”的夢想。並且，在科舉合格後，為了達到在官場出人頭地的目的，他們利用同鄉、同宗、同學、同行等各種“關係”<sup>①</sup>構築起關係網。因此，他們又具有能利用各種關係策動政治鬥爭的政治家的面孔。日本的學界對他們活躍的政治世界是怎樣理解的呢？讓我們來整理一下日本的研究狀況。

#### 1.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觀點 / 宏觀政治學觀點的共有

首先，在此從政治學的觀點整理一下“政治”這一概念。

① 有關宋代的政治人事關係的結構，參照拙稿(1998年)。有關現代中國政界的人事關係的結構，朱建榮在《解讀“人治國家”中國——崛起中的新生代群像》(日本經濟新聞社，1997年)一書中有清楚分析。在此書中，作者論述到中國的人治社會是由血緣關係、同鄉關係、同行關係、同學關係、信仰組織的五種關係網構成的。

作為政治學的一部分，政治史研究大約有以下兩種研究方法，即以分析國家的體制、國際關係等以國家為中心內容的宏觀政治學式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個別的政治現象的微觀政治學式的研究方法。日本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多屬於前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內藤湖南、宮崎市定提出“君主獨裁政治論”。該理論認為，唐代門閥士族政治——即由皇帝和門閥士族進行的協議式政治——由於門閥士族階層的沒落、平民力量壯大、科舉制的實施、貨幣經濟的滲透、新儒學和大眾文化的興起等社會、經濟、文化諸變革的發生，到宋代以後向着“君主獨裁政治”的方向發展（內藤虎次郎《中國近世史》，弘文堂，1947年）。另外，宮崎市定認為，中國近世的君主獨裁是指君主裁決的政治模式，一切政務由官僚反復研究方案，再由大臣仔細審查，最後報請皇帝批准（宮崎市定《岩波全書——中國史》，1978年）。“君主獨裁政治”並不是皇帝可以為所欲為的政治狀態，而是一種以高度發達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為基礎的政治體制。

另外，同樣是以宏觀政治學的觀點，也有像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學者以及中國史研究會提出的觀點，即：從秦漢帝國建立到清朝解體為止，中國一直維持着將權力集中於皇帝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小口，1980年；足立，1998年）。內藤湖南、宮崎市定把中國歷史分為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等幾個時期，在這種分期中，宋代以後屬於近世，而中國的近世的政治體制為“君主獨裁政治”。持“專制國家論”的學者則以持續兩千年的“專制國家”國家體制的連續性作為其研究的重點。如果僅僅從政治領域來看，雖然兩者的意見中有“變化”和“連續性”的不同之處，但是持有這兩種理論的學者也具有共同之處，即：以高度發達的官僚體制為基礎的皇帝集權體



制以及皇帝的最終政治裁定權<sup>①</sup>。

目前日本的宋代政治史研究正是以上述從宏觀政治學的方法得來的觀點為基礎，致力於從多個角度展開研究，來探討宋代政治的特性。縱觀其研究，我們可以看到：1. 皇帝的耳目官（“皇城司，走馬承受”，佐伯富《中國史研究》第一，東洋史研究會，1969年）、官僚的官職及升遷體系（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同朋舍，1985年）、官吏登用制度（科舉）（荒木敏一《宋代科舉制度研究》，東洋史研究會，1969年）等關於維持“君主獨裁政治”的官僚機構和制度的研究。2. 由國家和皇室財政構成的二元性財政結構（梅原郁《宋代的內藏和左藏》，《東方學報》42，1971年），在府兵制轉換為募兵制後，為維持百萬常備軍而建立起來的“邊境（軍隊）—都（政治）—長江下游（物資基地）”式的國家物資流通體系的發展（宮澤知之《宋代中國的國家和經濟——財政、市場、貨幣》，創文社，1998年）。3. 君臣關係的研究。比如從漢代、六朝時代的多重官府聯合及兩重君臣關係開始，以六世紀末隋文帝改革為起點，

① 近年發現的秦漢時代的木簡、竹簡，顯示出即使在二千年前，中國社會就已具備了與近代官僚制度類似的高度發達的文書行政體系和官僚機構，主張宋代以後政治體制特色是高度發達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的內藤、宮崎兩位先生的說明裏也出現了難以把握的地方。今後，有必要更細緻地探討官僚制的特質。本論的嘗試就是其一。如，從官僚制的視點進行比較探討時，參考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關於官僚制度的見解（《統治的社會學》1、2，《統治的諸類型》）。有必要對韋伯提出的家產官僚和現代官僚的類型對比，或稱現代官僚的標準（即（1）對職務的義務，（2）級別制，（3）權限，（4）自由的任用，（5）專門資格，（6）貨幣工資，（7）對兼職的限制，（8）晉升，（9）行政手段之公有，（10）職務紀律）進行比較分析。山田勝芳在《中國的官僚制度——東亞官僚制度比較研究序說》（《東北大學大學院國際文化研究科論集》創刊號，1993年）一文中做了這種嘗試。